

拼死創造的奇蹟

成在人，敗亦在人

● 石永貴（正中書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）

七七爆發全面抗戰

今年七月七日，是七七事變六十週年紀念日；同時，就在今年七月一日，歷經一百六十五年被英國統治的香港，地歸原主。無論六十年前的往事，以及剛剛發生的「香港光復」，都是近百年來中華民族的大事。套一句近代史常常用的一句話：真是可歌可泣。也都和列強瓜分中國不可分。

中國的外患，通常來自兩方面：

一是來自邊疆。

邊疆之患，乃是由於帝國皇族統治，經過武功文治之後，體能退化，智力昏庸以及生活腐化，無以爲繼，邊疆民族依靠強健身體，配合馬隊，再加上裏應外合（吳三桂爲典型），長驅直入中原，以元朝、清朝爲代表。

外國之患，所依所靠的是洋槍洋炮以及縱橫天下的旺盛侵略力，形成中國百年之外患，以來自英、日、俄爲甚。七七事變，就是發生在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，日軍重施「九一八」之故技，假演習之名，達侵略之實，砲擊河北省宛平縣，我軍守土有責，轟動國內外的盧溝橋事變爆發。

這一年—民國二十六年，是中華民族史上的重要一年。

「七七」這一天，也是中華民族史上的重要一天。

由於七七爆發，我政府忍無可忍，乃宣佈全民族進入救亡圖存緊急時期，準備迎接對日全面抗戰。盧溝橋事變後十天，七月十七

日，蔣委員長在廬山發表談話：

「北平若可變成瀋陽，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？所以，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整個中日國家問題。此事能否結束，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。萬一真到了不可避免的最後關頭，我們當然只有犧牲，只有抗戰！」（黎東方：蔣公介石序傳，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，中華民國六十五年，頁三五二—三。）

六十年前的「七七」，確實是中華民族存亡絕續的關鍵時刻。請看看當時發生驚天動地的大事：

八月十六日日軍進犯淞滬，全面抗戰爆發。
十一月，國民政府宣告遷都重慶。政府發表宣言：「……我們自決定抗戰自衛之日，即已深知此為最後關頭，為國家生命計，為民族人格計，為國際信義與世界和平計，皆已無屈服之餘地，凡有血氣之人，無不具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決心。」（黃文範：萬古盧溝橋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民國八十六年六月，頁四）。

蔣介石之言，果不幸言中，北平成為瀋陽，南京變成北平。十二月十六日，日軍入侵南京，進行瘋狂大屠殺，首都淪陷。
這一年，中、蘇簽訂不侵犯條約。

這一年，軍委會改編共軍為八路軍。

我們都知道，蔣公大舉圍剿江西共軍，共有五次。北伐之後，蔣公為求統一，曾先後舉兵討桂、討馮、討孫桂、討閻馮孫桂。這些軍隊的主力，後來在蔣委員長號召下，在敵前敵後，都發揮了抗日殲敵之功能。

西安事變扭轉歷史

當然，頭一年—民國二十五年，十二月十二日發生「西安事變」，張學良、楊虎城劫持蔣委員長，二十五日蔣委員長歷險歸來，形成抗戰到底的大結合，也救活了中共的困境。借鄧小平與鄧榕父女的對話，可以傳神地說出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的「神話」：

我問過父親：「長征的時候你都幹了些什麼工作？」

父親用他那一貫簡明方式回答我：「跟到走！」（毛毛：我的父親鄧小平，台北：地球出版社，中華民國八十二年，頁三〇三）。

中華民族從來沒有這樣團結過，也從來沒有這樣堅強過，也從來沒有想法這樣一致過，一掃東亞病夫惡名，一盤散沙惡習成為歷史，真是四萬萬同胞成為一心。

經過八年抗戰，中國軍隊與中國人，真是以血肉之軀築成長城，損失慘重。根據大英百科全書的估算，盟國死亡的軍民共有：四千一百九十六萬人，其中中國方面，正面戰場損失戰鬥人員一百三十一萬人，平民約二千二百萬人。真是人類有史以來的慘禍。

於是乃有八年抗戰勝利，全面廢除不平等條約，收復失地、光復國土，但是由於英國，也是盟國，也是戰勝國，邱吉爾又霸氣十足，香港就成為例外。

請問，在當時那樣絕對劣勢的武器下，中國對日抗戰，何以會贏得最後勝利？

不是憑空掉下來的奇蹟，而是拼死創造的奇蹟：

一、有共同的目標與嚴肅使命。那就是抗日救國。「打倒日本鬼子」，就是大家日日夜夜所念的。

二、唯一與絕對的領袖，那就是蔣委員長。因為他有思想、有作爲、有人才，更有準備，只有他能團結各方，日本人知道，反對蔣先生的政敵、軍閥也知道。當時蔣委員長是人民心中的「民族救星」，並不爲過，事實上，他就是聖經中的「摩西」，比「出埃及記」更悲壯、更艱困、更感人。

三、上下一心，內外一致。不做亡國奴，國破家亡，全靠抗戰到底結成的精神力量。

國際特別是美國支持，全球華僑犧牲，捨家捨業，投入抗戰救國大熔爐。

四、知識份子、青年學生、輿論界，追隨政府，跟著蔣委員長走。北方學者如胡適等參加廬山談話會，大公報從天津到上海到武漢到重慶，政府到那裡，他們就到那裡，他們就搬到那裡，無條件支持政府，並準備犧牲自己的事業，奉獻給艱苦抗戰的政府。蔣委員長向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先生保證：只要有政府在，南開大學就會在。南開師生與政府共存亡。當時的清華大學歷史學教授，後來在聯合國外交有極大成就的蔣廷黻博士就說：「如非蔣介公的知遇、厚愛，我的個性，並不適合中國官場。」（曹志源：愛國學人蔣廷黻，中外雜誌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，第三三四期，頁第一二一）。

風雲際會將才輩出

五、人才輩出，陣前敵後，名將如雲，蔣委員長均能將每個人發揮至極致。如蔣夫人無論在對美外交、主持航空與慰問傷患戰士，可謂時代女性，難出其右。宋子文之外交，孔祥熙對抗戰時期財政貢獻，胡適以在學術崇高地位，出使美國，爲羅斯福總統長期之白宮貴賓，真是無往不利。

至於軍事方面，無論來自黃埔子弟、老軍人系統、地方勢力、國外軍事留學生（以維吉尼亞軍校孫立人爲代表），真是風雲際會，將才輩出，出生入死，均能爲蔣委員長所用。蔣夫人所主導、董顯光所主持的國際宣傳陣容，真是極一時之選，如：曾虛白、葉公超、魏景蒙、沈劍虹、朱撫松等，後來他們在外交與國際宣傳，都有非常的成就。

六、堅壁清野，積小勝爲大勝，以空間換取時間，堅持與堅守對日軍事戰略：「勝也好、敗也好，就是不同他講和。」「堅壁清野」，據一種說法，是一次蔣先生與白崇禧在桂林一次散步中，白向蔣報告。事實上是來自蔣委員長尊師曾文正公的湘軍戰法。「勝也好、敗也好，就是不同它講和」，是中國大軍事家蔣百里先生的構想，形成游擊戰之精神：咬住他、纏住它最後消滅它。（黎東方：蔣公介石序傳，台北：頁三七六）東北義勇軍與游擊隊，是抗日戰爭中的敵後無所不在的力量。它的厲害處，在它能看見敵人，敵人識不出他們。胡志明就是以抗戰游擊隊戰法，在越南戰場拖垮強大武力的美國。胡志明一生身分成迷，但他的經驗絕對與中國抗戰有關。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瑪拉在他的越戰回顧戰之罪一書中，有這樣坦誠的自責：「……我們還謠稱爲『人中之龍』，這樣的一群人怎會在越南一事上栽了這樣一個大筋斗？」（戰之罪，台北：智庫文化，一九九五年，頁一）越戰進入關鍵時刻，當時，蔣公在台曾告訴專誠來訪的美國特使：越戰不能再打下去，因爲敵軍與老百姓無法辨認。

七、走動戰地指揮。蔣委員長出生入死，如神奇化地出現全國戰場，追隨蔣公左右的陶希聖先生就說：委員長在那裡，抗戰指揮所就在那裡，可見其權威與靈活。

委員長所採用的戰地管理，就是今天企業界所流行的走動管理。

八、贏得國際，特別是美國輿論支持。當然，這都和宋子文、蔣夫人與美國淵源與所具備的條件攸關。如亨利·魯斯的時代周刊，就毫無保留地，支持與認定孫中山先生所創建的與蔣委員長所領導的戰時國民政府。無論魯斯、陳納德以及後來的馬歇爾將軍等，都深深地為蔣夫人的才華與丰采所吸引。

九、是思想戰是長期戰。這是蔣委員長的深謀遠慮與遠見，有異於當時的政客與軍閥。無論戰爭如何危急，他都重視人才的長期培養，如成立廬山訓練團、中央訓練團等等；也無論戰況如何緊急，他還是很重視學術思想的灌輸。如在廬山所舉行的國事談話會時期，胡適就受邀為當時受訓人員講：「程、朱、陸、王學說的異同」。另外，在民國三十年十月十六日，正是對日抗戰進入緊張激烈的時候，蔣委員長主持南嶺第三次軍事會議，李濟深在會中講授：「大學修身之道」，與白崇禧部長講：軍費情形，同為重要議程，可見蔣委員長之致遠作為，可比美諸葛孔明。

前事不忘後事之師

天下事功過成敗，真是在轉瞬間。綜觀蔣公一生事業四個階段：北伐、抗日、戡亂以及治台，與中華民族命運不可分。

其中，最為驕傲，也最能振興中華精神的，是北伐、抗日以及治台。成在艱困以及以少勝多。成在人、敗亦在人；成在性格，敗亦在性格。

今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復興的五十年，全世界，尤其是歐洲，都在歌頌「馬歇爾計劃」的成功，把馬歇爾比之為「耶穌再世」，但馬歇爾使華任務又如何？真是成也蕭何，敗也蕭何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之後，中國變成世界四強之一，但不到四年時間，兵敗如山倒，軍心潰散，人心解體，其原因，成之在人，敗也在人。抗戰期間能征慣守的名將，幾全成為中共戰俘營的螞蟻，如遠征軍的杜聿明，先種敗因於東北，後坐困徐州，傳作義是抗日戰爭中「北方」戰將，也葬送在自掘的「北平和平解放」，鄭洞國敗於「長春之圍」，陳明仁降於湖南家鄉……，一代名將，都是這樣結束，至於張治中、邵力子、章士釗……，都成為和平談判的送祭品，面對這樣殘酷事實，如今思之，能不痛哉，能不引以為鑑。

我們紀念六十年前的盧溝橋事變，憶及抗戰中國種種，歷歷如昨，閉目深思，如在眼前。真是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。中國是一個深具歷史經驗與智慧的民族，現實的問題，往往在歷史中找答案。

當然，歷史不會重演，但歷史有其模式。今天台灣我們所面對的環境，亦如七七事變前的錯綜複雜，內憂外患，紛爭不已，看似模糊，其實，還是很清楚；看似遠在天邊，其實，就在眼前。

台灣何處去？中國往何處去？全在兩岸政治人物一念間。中國抗戰勝利，還不值得珍惜；勝利後的經驗，還不夠慘痛嗎？